

瑞经与瑞像：绵阳碧水寺 初唐摩崖石刻的再讨论*

杨 筱

内容提要 绵阳碧水寺第10龕《金刚经》，刊刻于初唐贞观年间，是我国西南地区现存最早的佛教摩崖刻经。本文讨论了该龕刻经的来源、性质及与相邻龕像的组合关系，认为其开凿与唐初《金刚经》感通故事的流行密切相关。第10龕《金刚经》与第19龕阿弥陀佛五十菩萨像为成组设计，分别表现瑞经和瑞像，共同彰显佛教的神异灵瑞，是唐初佛教感应思想盛行的产物，亦与这一时期北方官员及僧人大量入蜀、绵阳周围佛教势力急速上升有关。

关键词 唐代摩崖石刻 《金刚经》 阿弥陀佛五十菩萨像 佛教感应思想
DOI:10.16319/j.cnki.0452-7402.2025.06.004

绵阳碧水寺位于四川省绵阳市游仙区涪江东岸[图一]。现存摩崖石刻25龕，雕刻精美，内容丰富，为唐前期川渝地区石窟研究的重要材料^{〔1〕}。其中，第10龕《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简称《金刚经》）镌刻于唐贞观年间（627—649），是西南地区现存最早的佛教摩崖刻经。于春、王婷认为该龕的供养人可能是麟德元年（664）道宣所撰《集神州三宝感通录》中一则故事的主角“令狐元轨”^{〔2〕}。本文在学界刊布报告及实地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尝试以第10龕《金刚经》为中心，考察刻经的来源、性质及与相邻龕像的组合关系，蠡测碧水寺摩崖造像与地域社会之间的关联。

一 碧水寺第10龕《金刚经》

碧水寺摩崖造像集中开凿于碧水崖向外凸出的山岩上[图二]。山岩距离现今地面2.3—4.5米，右下方有清泉一泓。第1—23龕分布于岩体西壁。除第1、2龕位于北端下部，其余龕像开凿于崖壁中部，从上至下、从左至右依次编号。第24、25龕分布于岩体南壁。第25龕下部断裂残损，残存部分曾为环氧树脂

* 本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启计划”资助项目“川北地区隋至唐初佛教摩崖造像研究”（项目编号：2024QQJH071）的阶段性成果。

〔1〕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四川大学艺术学院、绵阳市文物局《四川绵阳碧水寺唐代摩崖造像调查》，《文物》2009年第2期，第57—77页。

〔2〕 于春、王婷《四川绵阳碧水寺摩崖造像的相关问题》，《四川文物》2009年第3期，第73—79页。

〔图一〕绵阳碧水寺位置示意图

杨筱改绘 底图采自国家地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



〔图二〕碧水寺唐代佛教摩崖造像

杨筱摄



〔图三〕碧水寺第10龕《金剛經》刻經
杨筱摄



脂加固。第10龕为横长方形龕，所刻《金剛經》位于西壁中部〔图三〕，刻经部分残高120厘米，残宽273厘米，最大进深25厘米。龕顶大部残损不存，底部有后期修凿痕迹。左侧无侧壁，与相邻第19龕右侧边框相接，共用中线。右侧侧壁保存相对完整，下部被第8、9龕打破。龕内以线格为地，楷书隸

秀，原刻54行94列，上部9行及左起5列风化严重，已无法辨识。需要指出的是，第10龕与第7、19、20、25龕规模较大，高度相仿，又占据崖壁中部，应为遗址中最早开凿的龕窟。学者依据造像样式和方志文献，推断这一批龕窟开凿于贞观时期^{〔1〕}。现有龕窟与方志文献的关系较为复杂，后文将再加详述。单就造像本身而言，第19龕阿弥陀佛五十菩萨像和第20、25龕后壁的八部众像，见于梓潼卧龙山千佛崖贞观八年(634)的第1龕和第2、3龕^{〔2〕}。第19、20、25龕菩萨像腰腹扭动、略呈S形，已有唐代风貌，但与高宗、武周时期身体丰腴、姿态摇曳的菩萨像仍有差距，实为贞观时期造像样式^{〔3〕}。因此，碧水寺这批较早开凿的龕像应为贞观时期作品，第10龕亦不例外。

《金剛經》起首部分风化不存，末尾题刻：“比丘比丘……皆大欢喜，信受奉行……四月八日造。”经文与《大正新修大藏经》(简称《大正藏》)所收鸠摩罗什译本《金剛經》基本一致。最大的差异在于碧水寺刻经缺失62字，即：“尔时，慧命须菩提白佛言：‘世尊，颇有众生于未来世，闻说是法生信心不？’佛

〔1〕 前揭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四川绵阳碧水寺唐代摩崖造像调查》，第76页。

〔2〕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梓潼卧龙山千佛崖摩崖造像》，载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绵阳市文物局《绵阳龕窟——四川绵阳古代造像调查研究报告集》，文物出版社，2010年，第115—156页。

〔3〕 常青、王振国《龙门隋代和唐代贞观期龕像及其保守与多样风格》，《石窟寺研究》第8辑，科学出版社，2018年，第130—165页。

言：‘须菩提，彼非众生，非不众生。何以故？须菩提，众生、众生者，如来说非众生，是名众生。’”¹¹以上文字亦不见于河南洛阳龙门石窟龙朔三年(663)第429龕刻《金刚经》及河南林州洪谷寺千佛洞乾封元年(666)所刻两部《金刚经》¹²。牧田諦亮¹³、方广锜¹⁴指出，此62字为后世校经者据菩提流支译本《金刚经》增补，不属于鸠摩罗什所译原文。从敦煌文书逸文增补的按语来看，增补之事发生于晚唐，此62字又称为“冥司偈”或“冥世偈”，传为长庆二年(822)灵幽法师入冥还魂后于濠州石碑所得。因此，碧水寺刻经的缺字恰反映了罗什本《金刚经》原貌。

北齐以迄隋代，于摩崖或巨石之上镌刻佛经的做法盛行一时。邳城周围以石窟刻经为主，山东地区多见大字摩崖，北京房山流行石刻经板¹⁵。包括四川在内的广大南方地区，直至唐代佛教刻经方显遗踪。年代较早的实例有都江堰灌县灵岩山发现的唐代石经，经文镌刻于方形石板之上，两面刻字，上有方格，形制与房山云居寺所见经板类似。胡文和认为，灵岩山刻经与益州多宝寺释道因关系密切。释道因，俗姓侯氏，河南濮阳人，隋末避难入蜀，居益州多宝寺，后于彭门山寺习道安居，“遂于寺之北岩，刻书经典，穷多罗之秘帙，尽毗尼之正文”¹⁶。根据地理沿革及地形地势，胡文和指出彭门山即今灵岩山，道因的北岩刻经应即今灵岩山石经¹⁷。碧水寺刻经与灵岩山石经始凿年代相近，但刻经形式迥异。碧水寺《金刚经》镌刻于山岩西壁，与其他摩崖造像一同向信众展示。这种刻经形式令人想起邳城周围北朝至隋代佛教石窟中刻经与造像并行的传统¹⁸。不过，碧水寺的《金刚经》被有规划地镌刻于横长方形龕中，与邯郸南北响堂山石窟、安阳小南海石窟等借助窟室壁面刻经的情况略有区别，而与曲阳八会寺隋代开凿的石刻经龕最为接近，是唐初四川地区承继中原北方佛教石经传统的又一实例。

二 “令狐文轨”与“令狐元轨”

何志国、李其堂参考清同治《直隶绵州志》及民国《绵阳县志》，提出碧水寺应即唐宋时期的开元寺水

〈1〉 前揭于春、王婷《四川绵阳碧水寺摩崖造像的相关问题》，第77—79页。

〈2〉 王振国《龙门石窟刻经研究》，《华夏考古》2006年第2期，第78—87页。

〈3〉 [日]牧田諦亮《漢訳仏典伝承上の一問題——金剛般若經の冥司》，《竜谷史壇》1966年第56、57期，第116—128页。

〈4〉 方广锜《藏经洞敦煌遗书与敦煌地区的大藏经》，载张弓主编《敦煌典籍与唐五代历史文化(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183—214页。

〈5〉 前揭王振国《龙门石窟刻经研究》，第83页。

〈6〉 (北宋)赞宁《宋高僧传(上)》，中华书局，1987年，第26页。

〈7〉 胡文和《灌县灵岩山唐代石经》，《四川文物》1984年第2期，第33—35页。

〈8〉 李裕群《邳城地区石窟与刻经》，《考古学报》1997年第4期，第443—479页。

阁院，嘉庆五年(1800)于原址上建阁，嘉庆十一年(1806)重修时已改易今名^①。其中，最为关键的文献证据是一则北宋题记：“大观元年(1107)冬，与表弟都奉郎李益侯圣举、通直郎李仲侯君宜，往开元寺，观先辈郡守李同叔所建水阁院。北岩正观时令狐文轨施造经像，极工致，叹其历会昌以来渐黯淡，遂醵金彩绘，焕然生色。朝奉大夫文轸记。”“正观”即“贞观”，可佐证碧水寺为唐代造像。于春、王婷借助唐代佛教文献进一步考证了“令狐文轨”的身份^②。据道宣《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卷三：“贞观五年(631)，有隆州巴西县令令狐元轨者，信敬佛法，欲写《法华》《金刚般若》《涅槃》等……还岐州庄所，经留在庄，并《老子五千文》同在一处。忽为外火延烧，堂是草覆，一时灰荡。轨于时任冯翊，令家人相命，拨灰取金铜经轴。既拨外灰，其内诸经宛然如故，黄色不改，唯箱帙成灰。又觅《老子》，便从火化，乃收取诸经。乡村嗟异。其《金刚般若经》一卷题字焦黑。访问所由。乃初题经时，有州官能书，其人行急，不获洁净，直尔立题，由是被焚。”^③令狐元轨于贞观五年任隆州巴西县(今绵阳东)县令，与碧水寺摩崖造像开凿的时间、地点重叠，于、王据此推测二者应为一，方志中“令狐文轨”为“令狐元轨”的误抄。

现存唐宋时期的文献中，有三则记录与“令狐文轨”有关。其一，元和七年(812)林宝编纂的《元和姓纂》记敦煌令狐氏，“又后周河州刺史纂，状称馨后。孙文轨，生思抚。思抚，唐地官郎中、郑州刺史；思挹，万年令”^④。其二，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唐右金吾郎将马君夫人敦煌令狐氏墓志》拓片，令狐氏卒于上元二年(761)，春秋五十，“曾祖文轨，皇汾州长史。祖思拯，皇利州嘉川令”。后迁厝岐州，“即夫人家迹，非远先茔，□令归魂而无依也”^⑤。其三，北宋赵明诚《金石录》：“第五百八十二，令狐文轨像铭，薛纯正书。贞观十四年六月。”^⑥敦煌令狐氏为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北朝官方写经最为重要的赞助家族^⑦，与故事中“信敬佛法，欲写《法华》《金刚般若》《涅槃》等”暗合。马君夫人令狐氏迁葬家乡岐州，与“令狐元轨”故事中“还岐州庄所”相符。“令狐文轨”“令狐元轨”为同一人，出身敦煌令狐氏内迁岐州一支，应无疑议。然而，“令狐文轨”见于谱牒、墓志、金石录、地方志等多种文献。“令狐元轨”虽见于多部

① 何志国、李其堂《绵阳碧水寺摩崖造像》，《四川文物》1987年第3期，第36—38页。

② 前揭于春、王婷《四川绵阳碧水寺摩崖造像的相关问题》，第73—79页。

③ (唐)道宣《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卷三，《大正新修大藏经》(以下简称《大正藏》)第52卷，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0年，第428页。

④ (唐)林宝撰，岑仲勉校《元和姓纂(附：四校记)》第1册，中华书局，1994年，第632—633页。

⑤ 孙兰风、胡海帆《隋唐五代墓志汇编：北京大学卷》第1册，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67页。“上元二年”相关辨析，参见孙英刚《无年号与改正朔：安史之乱中肃宗重塑正统的努力——兼论历法与中古政治之关系》，《人文杂志》2013年第2期，第65—76页。

⑥ (宋)赵明诚撰，金文明校《金石录校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50页。

⑦ 孔令梅、杜斗城《十六国北朝时期敦煌令狐氏与佛教关系探究》，《敦煌研究》2010年第5期，第99—104页。

佛教典籍，但皆传抄自《集神州三宝感通录》¹。因此，“令狐元轨”为“令狐文轨”误记的可能性要更大。

此外，目前所见绵阳地区的诸多方志中，“开元寺”与“碧水寺”为分列条目[附表一]。二者各有崖刻经像，且令狐文轨相关题记皆列于“开元寺”条下。如，现存方志中年代最早的清嘉庆《直隶绵州志》“开元寺”条云：“今北坛即古开元寺废址……坛之右为古水阁院，背岩刻石肖像，上刻《金刚经》。嘉庆五年，里人建小阁以护之。”“碧水寺”条云：“岩镌佛像并《金刚经》三十二品犹存。岩下清泉涌出。”²民国《绵阳县志》新增数语，推测碧水寺即开元寺水阁院，但又言其与开元寺经像为同时开凿。“开元寺”条：“今寺中石刻造像有正观、总章、会昌等号……旧有石刻《金刚经》，已为无识。妇竖以灰垩蔽，更建佛龕于下壅之，莫可睹矣。”“碧水寺”条：“案《旧志》称开元寺右有水阁院，背刻崖石肖像及《金刚经》。里人建小阁护之即此。其与开元寺中崖刻之经像，为正观时同造者可知”³。若开元寺另有一处崖刻经像，令狐文轨所施造者就不一定是碧水寺现存石刻。可惜开元寺旧址现已湮没，除迁移至碧水寺一尊观音像外，原初崖刻情况不明⁴。从现有材料来看，实难确认令狐文轨与碧水寺石刻之间是否存在直接关联。

不过，无论碧水寺石刻是否为令狐文轨施造，“令狐元轨”的故事都为理解碧水寺刻经的意涵提供了重要线索。佛教借助中国祥瑞感应思想，将与佛教有关的各种神异、灵瑞称为“感应”或“感通”。道宣《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即为这一传统在唐初的集大成之作。该书依据感应之物的不同，分类整理各类故事，“初明舍利表塔，次列灵像垂降，后引圣寺、瑞经、神僧”⁵。“令狐元轨”列在“瑞经”一类。故事以火灾中佛经不燃、道经湮灭，强调佛教优于道教。借助《金刚经》卷首焦黑、余部无恙，突出写经需要注重“如法”。写经之事发生于“令狐元轨”担任巴西县令之际，与贞观时期令狐文轨施造经像一事互为印证，反映了这一地区唐初《金刚经》刻经及相关瑞经信仰的盛行。即便碧水寺现存刻经并非令狐文轨所施造者，“令狐元轨”的感通故事对讨论同一时代、同一地区、同一经典的碧水寺刻经仍具有指引意义，应结合故事中反映的《金刚经》信仰着重考虑碧水寺刻经作为瑞经的性质。

实际上，《金刚经》是唐前期最具代表性的瑞经之一。贞观时期，萧瑀将《金刚经》相关的感通故事结集为《金刚般若经灵验记》⁶。这是第一部以单一佛经为中心的感通故事集，宣扬持诵《金刚经》可以延年

1 除去道宣《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卷三(《大正藏》第52卷，第428页)，“令狐元轨”一事还见于道宣《大唐内典录》卷一〇(《大正藏》第55卷，第340页)、慧详撰《弘赞法华传》卷一〇(《大正藏》第51卷，第45页)、道世《法苑珠林》卷一八[(唐)道世撰，周叔迦、苏晋仁校注《法苑珠林校注(二)》，中华书局，2003年，第605—606页]。

2 (清)李在文、范绍洵修《直隶绵州志》，四川省地方志编辑委员会辑《四川历代方志集成·第一辑》第15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5年，第230页。

3 蒲殿钦等修《绵阳县志》，四川省地方志编辑委员会辑《四川历代方志集成·第一辑》第19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5年，第546页。

4 开元寺旧址现为太极制药厂。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四川大学艺术学院、绵阳市文物局《四川绵阳碧水寺藏“开元寺石佛”调查》，《四川文物》2009年第2期，第16—21页。

5 前揭(唐)道宣《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卷一，《大正藏》第52卷，第404页。

6 邵颖涛《萧瑀〈金刚般若经灵验记〉文献辑佚》，《中国典籍与文化》2011年第4期，第117—123页。

益寿、消灾灭罪、坠崖无伤、往生净土等。遗憾的是，萧瑀所辑原书已佚，今人对《金刚般若经灵验记》及《金刚经》早期信仰的研究，多依据开元六年(718)梓州司马孟献忠所著《金刚般若经集验记》^①。梓州即今绵阳市三台县，孟献忠所辑感通故事来自经典记载及日常见闻，“经典之所传，耳目之所接，集成三卷，分为六篇”。在这一意义上，碧水寺刻经与《金刚经》的感通故事可以互为证据。一方面，从“令狐元轨”的感通故事和《金刚经》唐初信仰的情况来看，碧水寺的《金刚经》刻经应与佛教感应思想存在密切关系。另一方面，碧水寺刻经作为绵阳地区唐初《金刚经》瑞经信仰的产物，为讨论孟献忠编纂《金刚般若经集验记》之际的地域社会提供了难得的历史物证。

三 瑞经与瑞像的组合

从龕像布局和崖面遗迹来看，碧水寺西壁较早开凿的第7、10、19、20龕应为成组设计〔图四〕。第10龕与第19龕规模较大，占据岩面中心位置。第10龕刻经与第19龕内龕处于同一平面，第10龕左侧与第19龕右侧皆无侧壁、共用中线，为统一平整岩壁后并列开凿而成。稍有不同的是对岩体下部裂隙的处理。第10龕刻经结束于裂隙之上，裂隙之下空白，第19龕则将裂隙设计在两排小菩萨像之间，使得二者在视觉重心上出现了一定的高差。第10、19龕外侧对称开凿第7龕和第20龕。二龕内容与尺寸几乎一致，区别仅在于第20龕后壁增加了浅浮雕的八部众。类似位置对称、成对开凿的小龕，还见于皇泽寺第15龕左、右侧壁唐初补刻^②，梓潼卧龙山贞观八年第1龕外龕左、右侧壁^③，是这一时期川北地区佛教石窟流行的装饰方法。综上，碧水寺西壁龕像应以第10、19龕为中心，两侧配置第7龕与第20龕为装饰小龕。

第19龕表现阿弥陀佛与五十菩萨像〔图五〕。主尊阿弥陀佛着通肩袈裟，双手于胸前施转法轮印，结跏趺坐于从水池中升起的大莲花上。左侧菩萨持念珠，右侧菩萨似持莲茎(莲花残损)，身体呈现S形，头部倾向主尊，立于与大莲花茎干相连的莲台上。四十六尊小菩萨围绕于坐佛及二菩萨周围，除头光两侧二身跪坐供养外，余者皆坐于小莲花之上，姿态各异。这一图像广泛流行于唐前期，见于敦煌莫高窟、洛阳龙门石窟、浚县千佛洞及川渝地区的诸多中小型摩崖石刻^④。除去碧水寺第19龕，四川地

① 邵颖涛《〈金刚般若经集验记〉考述》，《图书馆杂志》2014年第2期，第109—112页。

② 雷玉华、王剑平《广元石窟》，巴蜀书社，2002年，第95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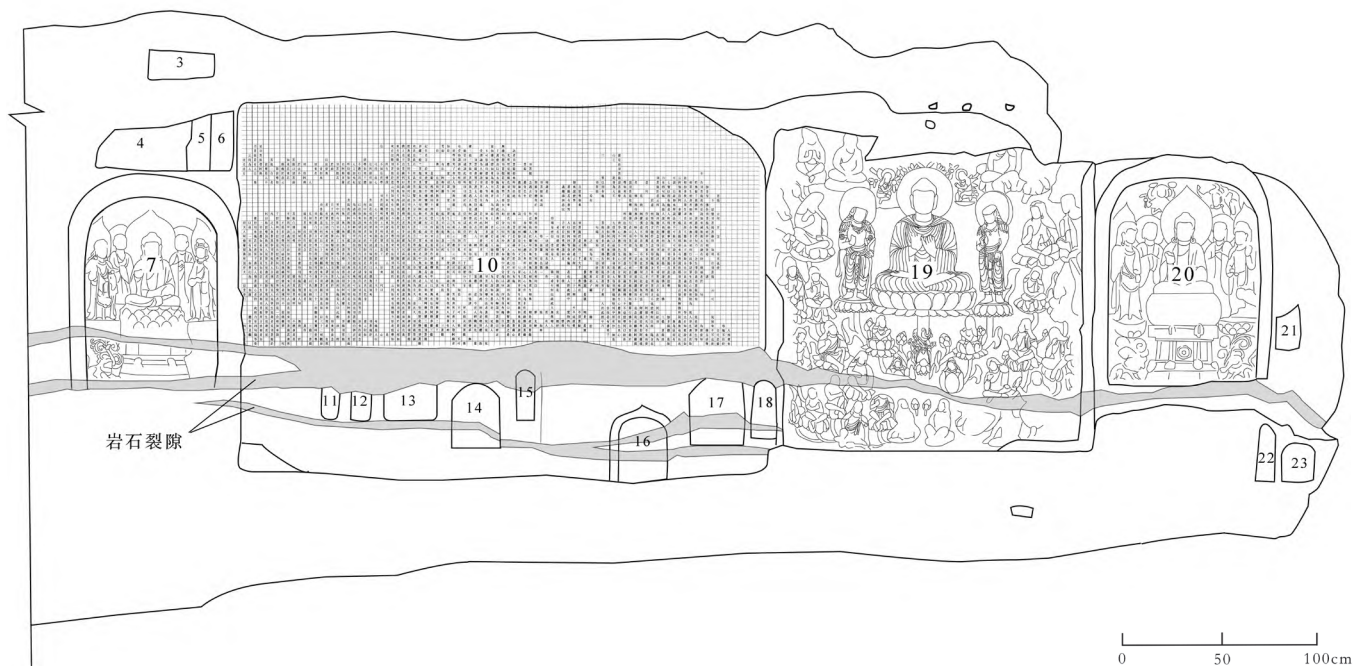
③ 前揭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梓潼卧龙山千佛崖摩崖造像》，第129—132页。

④ 王惠民《一佛五十菩萨图源流考》，载郑炳林、花平宁主编《麦积山石窟艺术文化论文集——2002年麦积山石窟艺术与丝绸之路佛教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兰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529—545页。

〔图四〕碧水寺西壁龕像布局示意图

杨筱改绘

底图采自前揭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四川大学艺术学院、绵阳市文物局《四川绵阳碧水寺唐代摩崖造像调查》



〔图五〕碧水寺第19龕阿弥陀佛与五十菩萨像

初唐 杨筱摄



区唐初同题材实例还见于梓潼卧龙山贞观八年(634)第1龕^{〔1〕}、通江千佛崖龙朔三年(663)第6龕^{〔2〕}、大足尖山子石窟永徽年间(649—655)第4龕^{〔3〕}。以上四龕作为纪年较为明确的早期实例,对研究阿弥陀佛与五十菩萨像初期的形态和传播具有重要价值。特别是卧龙山第1龕右侧,尚存一浅浮雕造像碑。碑文除去罗列供养人名录外,详细记述了阿弥陀佛与五十菩萨像的图像源流,为这一图像现存最早的文献记录。

〔1〕 前揭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梓潼卧龙山千佛崖摩崖造像》,第116—134页。

〔2〕 白彬、谈北平、郭振新、席凯《四川通江诺江镇千佛岩摩崖造像调查简报》,《敦煌研究》2020年第6期,第67—77页。

〔3〕 陈明光、黎方银《大足尖山子发现初唐石刻造像》,《四川文物》1988年第4期,第28—30页。

卧龙山碑文以“阿弥陀佛并五十二菩萨传”为题^①。初明图像缘起，“彼国鸡头摩寺，有五通菩萨至安乐世界，白阿弥陀佛言：‘世尊，娑婆世界，无世尊像，今愿得之，于彼供养。’佛言：‘可尔。汝且前去，寻遣送往。’菩萨即还。适到娑婆，其像已至。有一佛五十菩萨，各坐莲花，于树叶上图写，在菩萨前立。菩萨遂取供养。于是彼国始有此瑞像焉”。次明图像流传：汉明帝(58—75年在位)遣蔡愔入天竺，请三藏法师迦叶摩腾至洛州。三藏姊子法师，即迦叶摩腾之外甥，持此像入汉地，后持像而归。隋开皇元年(581)，明献法师从道齐长法师处得此图像，说其缘起，再次图写流布；开皇十六年(596)，豫州刺史郑某自本州摹画一例，并将其带入长安，于真寂寺流通、供养，长安地区始有斯像。同一故事亦见于道宣《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卷二^②、《续高僧传》卷一二^③及道世《法苑珠林》卷一五^④，但经豫州刺史传入真寂寺一事不见于道宣、道世等的记载，孙明利据此推测卧龙山所获阿弥陀佛五十菩萨像粉本可能来自长安真寂寺^⑤。

阿弥陀佛与五十菩萨像同西方净土信仰关系密切。于向东指出，五通菩萨求请阿弥陀佛像，旨在为众生提供净土信仰的愿力凭借，即道宣《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卷二所云：“娑婆众生，愿生净土，无佛形象，愿力莫由。”^⑥更为具体的例子见于《续高僧传》卷一二“隋江都安乐寺释慧海传”。慧海俗姓张，清河武城人，“常以净土为期，专精致感”。其自齐州僧道处得到阿弥陀佛五十菩萨像，“既冥会素情，深怀礼忏，乃睹神光昭烁，庆所希幸。于是模写恳苦，愿生彼土，没齿为念”^⑦。慧海依像观想礼忏，得神光感应，又描摹图像，以期往生净土，集中体现了阿弥陀佛五十菩萨像在净土法门中的功能与意义^⑧。有趣的是，“必生净土”也是唐初《金刚经》感通故事中极为重要的现实利益。萧瑀《灵验记》现存十五篇感通故事中，“遂州魏旻”“天水郡陇城县袁志通”“鄜州宝室寺僧法藏”皆因修持《金刚经》得长寿命终，即生净土^⑨。“遂州魏旻”的故事发生于贞观元年(627)，遂州即今四川遂宁，与碧水寺经刻时代、地点接近。碧水寺第10龕与第19龕的组合开凿，或与净土信仰相关，信徒借助刻经造像，增益善根，以期净土。

不过，在唐初佛教文献中，阿弥陀佛五十菩萨像还具有鲜明的瑞像性质。卧龙山碑文开篇即言：

① 前揭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梓潼卧龙山千佛崖摩崖造像》，第133—134页。

② 前揭(唐)道宣《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卷二，《大正藏》第52卷，第421页。

③ (唐)道宣撰，郭绍林点校《续高僧传(上)》，中华书局，2014年，第402—404页。

④ 前揭(唐)道世撰《法苑珠林校注(二)》，第524—525页。

⑤ 孙明利《阿弥陀佛五十菩萨像文献疏证》，《大足学刊》2020年第4辑，第282—301页。

⑥ 前揭(唐)道宣《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卷二，《大正藏》第52卷，第421页。

⑦ 前揭(唐)道宣撰《续高僧传(上)》卷一二，第403页。

⑧ 于向东《阿弥陀佛五十菩萨图像与信仰——兼论其与西方净土变的关联》，《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版)》2014年第6期，第10—15页。

⑨ 前揭邵颖涛《萧瑀〈金刚般若经灵验记〉文献辑佚》，第117—123页。

“阿弥陀佛五十菩萨像者，盖西域之瑞像也。”道宣《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将此像故事列在“灵像垂降”；道世《法苑珠林》以“隋五十菩萨瑞像”为题，归入“感应缘”。如王惠民所论，佛教瑞像的故事内容多与佛教徒的现实信仰有关，情节富有传奇色彩。阿弥陀佛五十菩萨像为安乐世界阿弥陀佛“真容”，又有五通菩萨求请、图像腾空而现等富有传奇色彩的情节，符合瑞像信仰的典型范式^{〔1〕}。张小刚^{〔2〕}及王剑平、雷玉华^{〔3〕}讨论敦煌地区及四川地区的瑞像时，都将阿弥陀佛五十菩萨像列为重要的瑞像题材。碧水寺第10龕《金刚经》与第19龕阿弥陀佛五十菩萨像可视为瑞经与瑞像的组合。二者虽形式各异，但性质相同，共同反映了绵阳地区佛教感应思想的盛行^{〔4〕}。

瑞经与瑞像的组合还见于前述龙门石窟的第429龕。该龕正壁为优填王像，着通肩袈裟，施说法印，倚坐方台之上。两侧壁刻鸠摩罗什译本《金刚经》及龙朔三年造像记一则。依造像记，该龕优填王像与《金刚经》为统一开凿，“佛弟子常才合家敬造优填王像一躯、《金刚经》一部，愿法界众生，共同斯福”^{〔5〕}。优填王像为释迦牟尼在世之时，印度憍赏弥国优填王依据其真实相貌所造佛像。作为世间最早的佛像及释迦牟尼之“真容”，此类佛像在各类佛教文献之中多有感应神通。肥田路美在讨论龙门石窟第429龕时指出，初唐后期《金刚经》以灵验感应著称，其与共同开凿的优填王像皆强调除灾招福之现实利益^{〔6〕}。龙门石窟第429龕《金刚经》与优填王像这一瑞经与瑞像组合，为唐初洛阳地区佛教感应思想盛行之物证。

四 结语

作为天师道勃兴的地区之一，绵阳地区的道教长期具有主导性优势。不过，从道教与佛教摩崖造像的消长来看，这一情况在隋末唐初有所变化，佛教僧团在绵阳地区势力快速上升，其弘法活动对当地道教团体产生了较大的压力^{〔7〕}。碧水寺摩崖造像恰营建于贞观时期，瑞经和瑞像的组合又与佛教弘法思想密切关联，应置于隋末唐初绵阳地区社会宗教版图的剧烈变动中予以考察。

一方面，南北重新统一之后，大量北方官员、僧人进入四川。上文讨论的令狐文轨出身于具有悠久

〔1〕 前揭王惠民《一佛五十菩萨图源流考》，第535—537页。

〔2〕 张小刚《敦煌佛教感通画研究》，甘肃教育出版社，2015年，第65—68页。

〔3〕 王剑平、雷玉华《四川唐代摩崖造像中部分瑞像的辨识》，《敦煌学辑刊》2009年第1期，第81—93页。

〔4〕 肥田路美已经注意到绵阳地区感应题材聚集的情况，参见〔日〕肥田路美《四川省綿陽地区の摩崖造像調査とその意義—道教像龕、阿弥陀仏五十菩薩像龕からみた地域性の問題を中心に》，载〔日〕新川登亀男、〔日〕高桥龙三郎编《東アジアの歴史・民族・考古》，东京：雄山阁，2009年，第90—120页。

〔5〕 刘景龙、杨超杰《龙门石窟总录：379号龕—543号龕》，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第22—26页。

〔6〕 〔日〕肥田路美著，颜娟英等译《云翔瑞像：初唐佛教美术研究》，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8年，第155页。

〔7〕 林圣智《道教造像与地域社会：四川绵阳玉女泉隋至初唐道教摩崖造像》，《中古中国研究》2017年第1辑，第151—190页。

写经传统的敦煌令狐氏。其在担任巴西县令期间，赞助经书抄写，又于此地留下了贞观时期的经像，积极地推动了绵阳地区佛教势力的兴盛及南北佛教物质文化的交融。同时，绵阳地处金牛道沿线，与成都一并成为隋末唐初北方僧人入蜀避战的聚集地。玄奘即为此次迁徙的亲历者之一。据唐慧立、彦棕《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初，炀帝于东都建四道场，召天下名僧居焉……末年国乱，供料停绝，多游绵、蜀，知法之众又盛于彼。”^①尽管目前尚未在绵阳造像中发现北方僧人参与施造的直接证据，但是这一时期绵阳地区率先出现了诸多与北方关系密切的造像要素，比如本文所讨论的摩崖刻经及阿弥陀佛五十菩萨像。这些造像要素不见于地理与交通上都更接近北方的广元，而是集中地涌现在已属四川腹地的绵阳。这种跳跃性的传播路径暗示着新出现的工艺、图像很可能与绵阳地区大量聚集的北方僧团有关。

另一方面，佛教需要借助超出日常生活经验的神瑞感应来争取异教信众。如，“令狐元轨”故事中，借助佛经与道经在火灾之中的不同命运，强调佛教应比道教更具有神力。不过，这一故事中巴西县仅作为佛教抄写之处出现，故事的高潮——佛经不燃却发生于岐州。对唐初绵阳地区佛道之间张力更为直接的记录见于道宣《续高僧传》收录的僧人传记。如，释宝琼，俗姓马氏，为益州绵竹人，“本邑连比什邡诸县，并是道民尤不奉佛”。李氏诸族设作道会，宝琼受邀参加，众人胁迫其礼拜道像，“道像并座动摇不安。又礼一拜，连座返倒摧残在地”。众人谓之风鼓，再试如前崩倒，“合众惊惧举掌礼琼，一时回信从受戒法”^②。以天尊像无法接受僧人礼拜，论证佛法的正统性和优越性。碧水寺中出现的瑞经与瑞像，本身即为佛教神圣性的证明。二者的组合开凿，进一步凸显了佛教的神瑞灵验，应是当时弘扬佛法、争取信众的利器。

道宣编纂《集神州三宝感通录》旨在主张中国佛教具有古老的渊源及正统性，以寻求帝王庇护，映现了唐初佛教界的复杂处境及强烈的危机意识^③。然而，《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并非道宣个人独立创作的故事集，其大量感通故事采集自地方社会。因此，其所映显的危机意识并不仅仅来自上层精英僧团，而亦汇集了各故事发生、流布之地的群体记忆。在这一意义上，碧水寺摩崖石刻中组合开凿的瑞经与瑞像，作为感通故事在地方社会流传的物质载体及关键节点，呈现了地域社会的变迁及佛教与道教之间的张力，为理解唐初佛教感应思想的多元面貌提供了新的角度。

附记：本文在资料收集与写作期间，得到了清华大学李静杰教授、海德堡科学院蔡穗玲博士、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李飞副研究员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易丹韵博士的帮助，在此深表谢意！

① (唐)慧立、彦棕《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大正藏》第50卷，第222页。

② 前揭(唐)道宣撰《续高僧传(下)》卷二九，第1180页。

③ 前揭[日]肥田路美《云翔瑞像：初唐佛教美术研究》，第277—320页。

〔附表一〕 现存绵阳方志所见开元寺与碧水寺

文献出处	开元寺	碧水寺	版本
(嘉庆)直隶绵州志(1814年刻本)/(同治)直隶绵州志(1873年刻本)	开元寺，参《旧志》治北一里天池山麓。今北坛即古开元寺废址。明李梓《开元山赋》碑刻尚存。坛之右为古水阁院，背岩刻石肖像，上刻《金刚经》。嘉庆五年，里人建小阁以护之。有石刻云：大观元年冬，与表弟都奉郎李益侯圣举、通直郎李仲侯君宜，往开元寺，观先辈郡守李同叔所建水阁院。北岩正观时令狐文轨施造经像，极工致，叹其历会昌以来渐黯淡，遂赭金彩绘，焕然生色。朝奉大夫文轸记。	碧水寺，治北一里碧水岩古刹也。岩镌佛像并《金刚经》三十二品犹存。岩下清泉涌出。门前石佛长丈余，系从开元寺废址中锄得，里人异此供养。嘉庆十一年重修。州吏目俞敬先诗：我自三湘来，遥带湘江碧。来游碧水岩，岩泉我莫逆。泉能鉴须眉，使我须眉析。泉能照肝胆，将我肝胆涤。宦游十二秋，盘桓匪伊夕。天池与扞参，几度散游屐。芙蓉艇放歌，富乐风欹帟。塔访东山东，洞扫白云白。煮酒酌天浆，烹茶吞雪液。探奇得胜地，众友乐幽僻。而我独心赏，在此泉与壁。江光展素怀，鱼鸟同欢适。沿岩读金经，临江邀月魄。信舟荡涪水，水长天影窄。羨彼白鹭飞，风送凌霄翮。翘望蜀云深，茫茫楚天隔。	四川省地方志编辑委员会辑《四川历代方志集成·第一辑》第15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5年，第230页；前揭四川省地方志编辑委员会辑《四川历代方志集成·第一辑》第16册，第282页。
(嘉庆)四川通志(1816年刻本)	开元寺，在州北一里天池山麓。《州志》今北坛即古开元寺废址。明李梓《开元山赋》碑刻尚存。坛之右为古水阁院，背岩刻石肖像，上刻《金刚经》。嘉庆五年，里人重建小阁以翼神像，仍号开元寺。附《宋文轸石像记》：大观元年冬，与表弟都奉郎李益侯圣举、通直郎李仲侯君宜，往开元寺，观先辈郡守李同叔所建水阁院。北崖观唐时令狐文轨施造经像，极工致，叹其历会昌以来渐黯淡，遂赭金彩绘，焕然生色。	碧水寺，在州北一里碧水崖。国朝嘉庆十一年建。《州志》寺本古刹，岩镌佛像并《金刚经》三十二品犹存。岩下清泉涌出。门前石佛长丈余，系从开元寺废址中锄得，里人异此供养。	(清)常明、杨芳灿等编《嘉庆四川通志》第2册，巴蜀书社，1984年，第1676页。
(民国)绵阳县志(1932年刻本)	开元寺，治北一里天池山下。《旧志》未详创建年代。查开元寺名，他县多有，大抵唐开元时建。今寺中石刻造像有正观、总章、会昌等号，皆距元宗之开元或前或后，自不当以开元定为年代。然或由开元时始扩而大之故名。旧有石刻《金刚经》，已为无识。妇竖以灰堊蔽，更建佛龕于下壅之，莫可睹矣。《宋文轸与表弟李益侯、仲侯同游开元寺记》：大观元年冬，与表弟都奉郎李益侯圣举、通直郎李仲侯君宜，往开元寺，观先辈郡守李同叔所建水阁院。北岩正观时令狐文轨施造经像，极工致，叹其历会昌以来渐黯淡，遂赭金彩绘，焕然生色。朝奉大夫文轸记。	碧水寺，治北一里。崖石上镌佛像并《金刚经》三十二品犹存。末尾年号漫灭，惟四月八日字可覩。崖下清泉不竭，凿池承之，泉味甘冽。门前石佛一尊高丈余，系从开元寺废址锄得，异此供养。案《旧志》称开元寺右有水阁院，背刻崖石肖像及《金刚经》。里人建小阁护之即此。其与开元寺中崖刻之经像，为正观时同造者可知。清嘉庆中吏目俞敬先诗：我自三湘来，遥带湘江碧。来游碧水岩，岩泉我莫逆。泉能鉴须眉，使我须眉析。泉能照肝胆，将我肝胆涤。宦游十二秋，盘桓匪伊夕。天池与扞参，几度散游屐。芙蓉艇放歌，富乐风欹帟。塔访东山东，洞扫白云白。煮酒酌天浆，烹茶吞雪液。探奇得胜地，众友乐幽僻。而我独心赏，在此泉与壁。江光展素怀，鱼鸟同欢适。沿岩读金经，临江邀月魄。信舟荡涪水，	前揭四川省地方志编辑委员会辑《四川历代方志集成·第一辑》第19册，第546-547页。

(续附表一)

文献出处	开元寺	碧水寺	版本
		水长天影窄。羨彼白鹭飞，风送凌霄翮。翘望蜀云深，茫茫楚天隔。《叙永郭延题碧水寺诗》：大水冲山去，伽蓝向野开。虹横北门渡，龟负越王台。隔岸渔歌起，凭阑夜气来。可怜唐代碣，一壁长莓苔。《又水调歌头碧水寺作》：楼观几时起，回出半山间。当门一片涪水，来去自年年。闲日登临选胜，细读鐫金文字，剥蚀费鑽言。问佛佛无语，相对两茫然。立移时，蓦回首，向窗前。隔岸高城，隐隐带炊烟。更有桑林坝子，和着几家茅舍，画意写黄荃。浮生如梦耳，好景且留连。《文学梁文成九日登碧水寺诗》：横截江云住，岿茺耸一楼。秋光涵远浦，山势压当头。下界飞铃语，危栏俯去舟。群峰攒四面，双塔画中流。野渡看人小，龕经劝客留。牛羊黄叶径，鸥鹭白苹洲。旧侣增离感，新诗迭唱酬。归途无限好，朗月豁吟眸。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责任编辑：盛 洁)

murals based on the Mahayana sūtra. The main chamber and corridors of the cave are depicted with Buddha preaching illustrations as many as 1,000 pieces at the initial stage. The artists created the complete stories about the thousand Buddhas of the fortunate aeon to be aspired to awakening, which is probably based on the classics from *Pūrva-Prañidhānas of One Thousand Buddhas of Bhadrakaplika-Sūtra* (《贤劫经·千佛发意品》). Cave 50, along with stylistically similar Cave 28 and 29, presents the native Kucha Buddhist sects over the Kumtura area, which are of more Mahayana style under the local governance of Anxi Protectorate (Ān Xī Dū Hù Fǔ in Chinese pinyin) of protectorate of the western regions of the Tang Dynasty.

KEYWORDS: Qiuci(Kucha); the Mahayana Buddhism; cave temples; Anxi Protectorate (Ān Xī Dū Hù Fǔ)

An Analysis of the Hanging-Screen Niche Enshrined with Painted Clay-Molded Buddhas and Emperor Statue in Fo Ri Lou

Zhang Yajing

*The article Chinese appears
from page 055 to 065.*

ABSTRACT: The hanging-screen niche with painted clay-molded Buddhas and incarnated Emperor Qianlong (乾隆) in the center is taken as a unique masterpiece of Buddhist art. There are 9 pieces of such kind of screens in the Palace Museum that have ever discovered, this thesis focuses on the one enshrined in the Buddhist Hall of Fo Ri Lou (佛日楼) based on the inscriptions on tsa-tsa (擦擦), craftsmanship, composition and content, etc, followed by the results: the inheritance of Buddhist masters in the images are under the Lam rim system; the niched hanging-screen of Fo Ri Lou is likely the oldest of the nine.

KEYWORDS: the Qing court; Buddhism; Emperor Qianlong(乾隆); tsa tsa; the hanging-screen niche enshrined with painted clay-molded Buddhas and the emperor's image; hanging screen; niche

Ruijing & Ruixiang: A More Analysis on The Early Tang-Dynasty Cliff-Carving at Bishuisi Temple in Mianyang

Yang Xiao

*The article Chinese appears
from page 066 to 078.*

ABSTRACT: The Buddhist scripture of Diamond Sutra in Niche 10 of Bishuisi Temple in Mianyang is considered as the earliest of the survival cliff-carving of Buddhist sutra in southwest China, which is created in the Zhenguan period of the Tang Dynasty. This thesis discusses the niched cliff-carving regarding its source, nature as well as the relationship with the images of neighboring niches, coming to the point that the construction of Niche 10 is closely tied with the prevailing miraculous stories in the Diamond Sutra during the Sui to early Tang dynasties. The cliff-carving of Niche 10 and the images of Amitabha Buddha and fifty Bodhisattvas of Niche 19 jointly make perfect in design, which respectively represent Ruijing (Miraculous Sutras) and Ruixiang (Miraculous Images) but jointly symbolize the

Buddhist divinities. It is the result of the Buddhist idea of Ganying (Sympathetic Response) in the early Tang Dynasty when a large number of northern officials and monks were entering the region of Shu with the rapid rising Buddhist force in Mianyang area in the 7th century meanwhile.

KEYWORDS: cliff-rock carving of the Tang dynasty; the Diamond Sutra; image of Amitabha Buddha and Fifty Bodhisattvas; Buddhist idea of Ganying

A Survey to the Architectural Space for ‘Ru Ge’ of the Five-Dynasty Imperial Court Ritual

Wang Shulin

ABSTRACT: The ritual session of ‘court-attendance’ evolves greatly in connotation and system from the Tang to the Song Dynasties, with the critical turning point in the Five Dynasties. The field survey of the location and changes of the names of the three main halls in Luoyang Palace of the late Tang and Five Dynasties is followed by the idea that the outer court’s main hall known as the Zhenguan Hall(贞观殿) in the Tang Dynasty is renamed Mingtang Hall(明堂殿), the middle court’s main hall called Wucheng Hall (武成殿) in the Tang Dynasty is renamed Wenming Hall (文明殿), and the inner court’s main hall named Chongxun Hall (崇勋殿) is renamed the Zhongxing Hall (中兴殿). The outer and inner court’s main halls located along the central axis of the imperial palace together with the middle court’s main hall on the western auxiliary axis form an inverted ‘L’ pattern, it makes inconvenient access to the court-attendance ceremony. So, the Five-Dynasty period ends the tradition of entering the inner court hall through the gate of ‘Gemen’ (阊门) of the main hall courtyard, but changed to go through one hall of Zhengya Palace. Based on the remnants of the Wenming Hall (文明殿) of the late Tang to Five Dynasties, this thesis analyzes the architectural space, finding the plane layout, interior zoning of the hall, column grid structure and access passages well-designed for fulfilling the court-attendance ceremony. The independent doorways on the east and west sides of the Wenming Hall(文明殿) probably work as the upper gates, by which the location and shape of the entrance of ‘Gemen’(阊门) is determined.

KEYWORDS: the Five Dynasties; ‘Ru Ge’ (imperial court attendance ceremony); Luoyang Palace; three main halls; court entrance

The article Chinese appears from page 079 to 097.

On The Value Interpretation and Space Expression of the Grand Canal Heritage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 A Model of Culture-Head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Zhao Yun

ABSTRACT: The Grand Canal has gone through significant evolution of the past thousand years, which once served grain shippment, now has been listed in the world heritages,

The article Chinese appears from page 098 to 106.